

[美国] 萧拉瑟 著 阎智森 译

Russell Shorto

Amsterdam

A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LIBERAL
CITY

世界最自由城市的历史
阿姆斯特丹



[美国] 萧拉瑟 著 阎智森 译

Russell Shorto

Amsterdam

A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LIBERAL
CITY

阿姆斯特丹
世界最自由城市的历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姆斯特丹：世界最自由城市的历史 / (美) 萧拉瑟 (Russell Shorto) 著；阎智森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11

书名原文：Amsterdam: A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Liberal City

ISBN 978-7-5447-7348-5

I.①阿… II.①萧… ②阎… III.①阿姆斯特丹—城市史 IV.①K56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98799 号

Amsterdam by Russell Shorto

Copyright © 2014 by Russell Shorto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Anne Edelstein Literary Agency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6-362 号

阿姆斯特丹：世界最自由城市的历史 [美国] 萧拉瑟 / 著 阎智森 / 译

责任编辑 王 蕾
装帧设计 周伟伟
校 对 季林巧
责任印制 单 莉

原文出版 Doubleday 2013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厂
开 本 718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5.25
插 页 20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348-5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质量热线：025-83658316

献给

帕梅拉、安娜、伊娃、安东尼、赖尼尔、赫克托和本杰明

目 录



第一部分 · 001

1 一次骑车出行 · 003

2 治水难题 · 023

3 权力变更 · 054

第二部分 · 093

4 公司 · 095

5 自由之城 · 136

6 “生活在一个共和国是一件难得的幸事” · 176

第三部分 · 203

7 影响力的种子 · 205

8 两种自由主义 · 247

9 “我们通知你，一支实力强大的德国军队正在展开行动” · 289

10 魔力中心 · 318

后记 · 351

致谢 · 354

注释 · 358

参考书目 · 370

译名对照表 · 383

I

第一部分



1

一次骑车出行



在阿姆斯特丹，我的一天是这样开始的：怀抱着我蹒跚学步的儿子从公寓出来，先用安全带把他固定在自行车两个车把中间的儿童座椅上，再把他的两只穿着运动鞋的小胖脚放进座椅踏板，然后，就该穿过我们城区内寂静、常有微风吹拂的街道，朝目的地进发了。一路上，洒满大地的晨曦白净如洗，与任何一位荷兰大师画作中的光线运用如出一辙：单调而又素净，既不明亮也不色彩斑斓。比如，地中海骄阳放射出的颗粒状橘黄微光，在此就丝毫不见踪影。我们所在的城区被称为老城南区。城区内的房子都是 20 世纪前二十年建造的三层或者四层的砖石建筑。当时，这是一座主要供工人阶级居住的欣欣向荣的城市。如今，这座空气中依旧飘浮着鲑鱼与烤咖啡豆气息的城市，仍在以中央核心运河为轴心迅速向外扩展。

我们骑车经过一些临街住宅。其中的几间住宅，遵循一种我觉得似乎与某个根深蒂固的开放承诺有关的荷兰传统，在房屋中央的显著位置设有一扇不带窗帘的窗户，把起居室内的一切都展示给大众，就好像住里面的这家人认为他们的生活值得在博物馆里展出一般。有一阵子，我不大明白，当我们抵达途中依运河而行的部分时，我的儿子为什么要发出一连串的高声尖叫。后来我才意识到，安东尼是在模仿水面上一面做出疯狂的弧形与俯冲运动一面厉声鸣叫的海鸥。

我们路过几间店铺。骑过面包房时，清晨的空气中常常夹带着肉桂的香气。街角自行车店的橱窗里，陈列着结实耐用、闪闪发光的新款单车。这批刚刚上市、喷涂柔和色调油漆的单车全部产自羚羊与巴塔弗斯公司，这两家荷兰公司已经生产了一个世纪的自行车。橱窗右边一扇敞开的大门通向自行车店的地下室以及一间我对其内部陈设再清楚不过的修理铺。向下延伸的楼梯两侧，混凝土阶梯上开有方便自行车上下的沟槽。

偶尔，我也会改变骑行的路线，拐进霍贝玛码头街。在那儿，我们的右边是一段看起来有些荒凉的运河，长满野草的码头里停泊着摇摇晃晃的船屋，而左边则是城内几处最小、最不引人注意的红灯区之一的残存建筑。德瓦伦，阿姆斯特丹最主要的红灯区，宛若平行宇宙中的迪士尼乐园，总是吵吵闹闹，不时还传出几声刺耳的欢呼。来德瓦伦参观的不光有醉醺醺的男性游客，也有手挽着手的情侣，甚至还有全家一起出动的。而这里则刚好相反，只有三四间被周围的住宅街所包围的橱窗，让城内持证的女坐坐在里面展示自己的身体。我从来都不知道嫖客是怎么找到她们的。尽管如此，即便在早晨，这里也都常常至少有一个妓女在当班。穿着泳衣的她坐在凳子上，要么抽烟，要么无精打采地敲打手机的按键。有时，她会朝安东尼挥挥手，冲他淡淡一笑。其他橱窗里则可能空无一人，只有一条板凳。对折起来放在上面的毛巾皱巴巴的，好像在以这种方式表明板凳上刚刚还坐着人。这些细节——弄皱了的毛巾；女人带着一脸倦容面对漫长的一天：除却与陌生人进行性交的短暂间隔外，其余时间只能靠百无聊赖地凝望街道消磨时光——让这座城市对堕落行径的声名狼藉的包容，褪去煽情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光环，露出极度庸常与凡俗的面目。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在这里居住过一段时间之后，异域风情带来的新鲜感总不免在庸凡生活的重压下消解崩塌。隔壁的隔壁是一家名为“奇爱”（Strangelove）的广告代理商。你可能会把这店名当成对附近性交易场所

的一种牵强附会的讽刺。但我不这么认为。我敢打赌，那些人甚至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店名。

“阿姆斯特丹学派”是一种建筑设计理念。它刚一诞生，便引领了我所在城区的建筑风格。这种建筑风格有一种形式美，并有其专属的技术名词与（社会主义）哲学基础。但在我看来，它仅仅象征异想天开与冷漠无情间的合理巧妙结合。砖石（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冷漠无情？）是完成建筑的媒介，却有一种无穷无尽的妙趣变化在里面：弧形炮塔般的转角；嵌入砖石中的似乎在嘲笑其刚硬与冷峻的装饰性雕刻（一个被兔子环绕的女孩，一个托举门框的婴儿）；以远洋渡轮或者结婚蛋糕为设计灵感的绵延整个街区的一幢幢寓所。

从运河带^①以及久负盛名的17世纪阿姆斯特丹核心区出发，只需不到五分钟的骑行，就能来到老城南区。但是，一百多年前的开发商规划老城南区的布局时，必定有一种需要把这片新区域同该城的历史联系起来的想法。如果伦勃朗参观我家附近的地区，或许会生发出些许亲切之感，因为，尽管这里在他的那个年代不过是沼泽和田地，但这里的街道多被冠以艺术家的名字，他曾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教导过他们，或者为了佣金与他们竞争过：为富裕阶层绘制精美的小型肖像画的弗里斯·范米里斯；注重观察人物面部细节，常以正在祷告或者吃饭的普通人为创作对象，还会满怀深情地精心勾画一条闪闪发光的面包或者桌上的陶罐的尼古拉斯·马斯；擅长描绘狩猎场面，并因成功地给一匹暴躁凶恶的马画像而出名的菲利普斯·沃弗曼。

老城南区破土动工之际，以上这些人全都是该城辉煌过去的典型代

① 以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车站为圆心层层铺开的五条半环形运河——辛厄尔、绅士运河、皇帝运河、王子运河以及辛厄尔运河。（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所加。）

表，因此，尼古拉斯·马斯和弗兰斯·范米里斯的名字，马上就能为这片新区域注入阿姆斯特丹往昔光荣岁月的风采——用简要但未必正确的话说，在这段岁月中，阿姆斯特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时至今日，这些街道旁的房子仍然显得尊贵而又威严。但随着你像我们所做的晨间之行那样从城区中央向外越走越远，四周的房屋也变得越来越平淡无奇。看起来，一个世纪前的城市元老们并不想把黄金时代的盛名播撒太远，以免其宏伟与尊贵被巨大的空间所稀释。另一方面，1905年，就在这片城区要向更远处扩展时，附近的阿姆斯特丹城市博物馆，即城内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国内首场文森特·梵高作品展。这位荷兰艺术家此时刚刚去世十五年；他的祖国曾对他不屑一顾，但现在，他们显然要开始关注他了。然而与此同时，他的名字并没有多少“布尔乔亚分量”——谁知道这些色彩明亮的浓厚漩涡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过诸如此类的考量之后，结果是，文森特·梵高街，如今这片区域内唯一一条街名马上就能被全世界的人所认出的街道，被最简陋的建筑所包围：一个街区的单调民宅。

这条街也预示着小小旅程的结束。当我和安东尼经过它的时候，我跳下车，解开他身上的安全带，把他抱到人行道上。我过去按门铃的时候，他走到那个跟他差不多高的信箱跟前，打开翻盖，朝里面呼喊。开门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摩洛哥裔妇女。她戴着头巾，穿着凉鞋和垂到地面的长袍。她一面带着一脸慈祥朝安东尼微笑，一面对他说，一个周末不见，他又长高了一点：“哦，你可真是一个大男孩了！”他玩了一个游戏，想试着从门口的阶梯直接爬上二楼，而不是从大门走进她家。伊曼和她的丈夫已经在阿姆斯特丹生活十年了。他们有两个年幼的女儿。她的丈夫是一名公交车司机，她是一个获得许可的“gastouder”，字面含义为“客串家长”，在美国则会被称为提供日托服务的人。她四岁的女儿，长着一头乱蓬蓬的卷发和大大的深邃眼睛的马尔瓦从她身后出来，一遍又一遍地大声

地说你好。然后，马尔瓦告诉我，安东尼长得很丑。再然后，她给了安东尼一个拥抱，并把他拽进屋里。

伊曼和我闲聊了几分钟。几星期之前，她问我能否和安东尼的母亲在一份支持她姐姐的移民文件上签字，因为她姐姐想来阿姆斯特丹拜访他们。最初，这事把我弄得一头雾水：我以为，只有打算移民的人，才需要得到某些支持性的声明，而不是某个仅仅想来此地拜访家人的游客。后来我才知道，想从某些国家（教育水平低下的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穆斯林国家）前往荷兰的人，现在需要提交大量的申请，包括荷兰居民对他们的担保，甚至在他们不过是想看一看运河和郁金香时也必须如此。几星期过后，伊曼说，她姐姐的申请被拒绝了。理由是：她是“onbetrouwbaar”（不可靠的）。当伊曼通过一位移民局的律师询问被拒的具体原因时，她被告知：原因是，她姐姐在荷兰国内有“关系”，他们害怕她的姐姐会一直待在荷兰。伊曼对此大惑不解。她和她的丈夫都是合法、按时交税的荷兰居民，一家人在家里说的也都是荷兰语。用他们的话说，他们全都是按规矩行事的人。但他们的合法居住身份本身，却被当作不值得相信的理由。很久以后，决定被颠倒过来，伊曼的姐姐获准前往荷兰，但这件事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最让人莫名其妙的一点：历史上的阿姆斯特丹因倡导包容理念而闻名于世；如今，它似乎正在为自己的不包容划定古怪的新疆界。

每周，总有那么一次，在我将安东尼交由伊曼照顾之后，我不会直接回家，而是利用上午的其余时间，探索与荷兰式不包容截然不同的属于另一个极端的不包容。走上另外一条路的我，会在贝多芬街的街角停车（现在的贝多芬街正重新变为该区的时髦部分；该区的商业步行街很适合被冠以伟大的名字——附近是鲁本斯街和巴赫街），细细打量街角花店的售货亭，买一束杂色郁金香或者淡紫色的玫瑰，并摁响几步之外的一扇大门上的门铃。上楼之后，一位长着青灰色的短发、棱角分明的下颌以及娇小秀

美的敏捷双眼的老太太起身迎接了我。她的名字是弗里达·门科。我们用标准的荷兰问候方式，互相亲吻对方的面颊三次。我把花递给她，她则温和地抱怨说，我不用再买花给她了。随后，我们一同进入她家。她家的客厅和餐厅十分宽敞明亮，满是零星错落放置的最现代的家具。咖啡桌上摆着丰盛的小吃：曲奇饼、巧克力，还有一壶咖啡、两个杯子、一大罐水以及一瓶鲜花。

我们在桌边坐下。我打开录音机。我们相互寒暄几句。接着，她把脸转向从窗户射进来的淡淡日光，说道：“现在开始吧。上次我说到哪了？”¹

外面有一个人在叫喊——不，是很多人，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叫喊。列车突然晃动起来，裹尸袋内的尸体也跟着摇来晃去，人们开始大声尖叫。弗里达那时十六岁，已经在一名她不认识的中年男子的腿上蜷坐了两天两夜。原本用于运送牲畜的车厢现在挤满了人，紧张焦灼的气氛似乎是人群惊恐的原因之一，但无情的力量带来的一波又一波巨大的死亡阴影所造成的重压，才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空气中满是他们排泄物的恶臭——角落里的一个水桶一直被他们当作开放的公共厕所使用。坐在高得离谱的水桶上想要方便一下的她，不仅要忍受在公开场合进行这一私人行为的尴尬，还必须尽力在桶的边缘保持平衡，以免不慎将其打翻。车厢内没有窗户，而且，车门被滑上之后，连一丝光线也没有；四周的空气死一般的黑暗，让人窒息。有时，她能勉强瞥见挤坐在车厢另一端的父母——他们的眼中充满恐惧，却也闪烁着一丝坚定的、近乎不可动摇的希望之光：她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终于，她总算从车厢里出来，站在坚实的地面上。有更多的喊叫声传来——真正的混乱场面尚在远处。远处有一台绞刑架，挂在上面的一具男人尸体在空中荡来荡去。远处的人正在奔跑，大声尖叫。车厢这边，他们

正被一个个塞进不同的队列。这时，一些人分开队列来到他们中间，这些人与他们同为犹太人，但全都身穿蓝白条纹的囚服，而且对这里的例行程序十分了解。这些人在他们面前压低声音费力地说：如果你有任何值钱的东西，赶快把它给我，因为德国人马上就会把它们收走。一些新来的人交出他们的珠宝；她什么也没给，因为她什么也没有。他们站成四排：两排是女人和女孩，两排是男人和男孩。她和母亲被分到同一排，在最右边。紧挨她们的是另一排女性，这些第二排里的人，很快都将被认定不适合参加工作，正直接朝毒气室走去；不过，那时的她对此还一无所知。然后，她看到站在第三排的父亲。军犬和士兵在四周看守着他们，确保他们全都待在原地。士兵身着军装，头戴德式钢盔——一种臭名昭著而又凶恶吓人的铲形钢盔。不过，这些事物那时尚未被贴上邪恶的标签，尚未被赋予它们未来所要承担的沉重意义。

一个严峻的几何问题摆在她的面前，亟待她找出解决的方法：随着人群开始向前晃动，她父亲所在的队列，与她和她母亲所在队列间的距离越拉越远。

随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看见她的父亲好像在盘算着什么，并做出一个与他性格极不相符的鲁莽决定。他突然向前猛冲——跑过空地，迅速通过队列间的真空地带，穿过挡在他的队伍和母女俩队伍间的第二排女性，一点也没把拿着枪、戴着钢盔、穿着灰色制服的士兵放在眼里。他过来了，气喘吁吁，他的脸，那张温柔、圆胖、和蔼的脸紧挨着她。他有一颗艺术家的心，却总是不得不屈从于商业的需要。若埃尔·布罗梅是一名专业的橱窗设计师，同时还函授平面设计方面的课程。弗里达是他快乐的源泉。在他们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家中，她为他的工作提供帮助，转动摆在起居室角落里的油印机的曲柄，印出一张张油墨味的纸。每一张纸上都有精心打印的课程安排，都以“尊敬的学生”作为开头。这一摞摞纸被折叠

起来，塞进棕色的信封，寄到国内大大小小的城镇和乡村，寄给想要逃离耕种或者捕鱼劳作、奔向一种更具魅力的生活的年轻人。有时，她跟父亲一同外出，来到商铺，观察他如何完成新的作品。他向她展示橱窗陈设每一个细节的打造过程：标价、广告牌（“特价！十三分币”）、摆好姿势的人体模型等。弗里达最初的记忆就是关于他的。在他们舒适的中产阶级住宅里，三岁的她躺在床上，开心惬意而又昏昏欲睡。“你能为我把月亮摘下来，放在橱柜上吗？”她至今还记得那个橱柜的样子，还有她那时的想法——把银盘一样的月亮放在橱柜上，该是一种多么美丽的装饰。他回答说：“如果你能像一个可爱的小姑娘一样乖乖睡觉的话，我就去找一架长长的梯子，把月亮给你摘下来。”

一阵风吹过波兰的平原。有人正在高声下令：一名发现她父亲离队的党卫军士兵正快步朝他走来。若埃尔·布罗梅张开双臂将妻子紧紧搂住，深情地拥吻了她：再见了。然后，同其他所有人一样，这名橱窗设计师在新强制力的重压下乖乖服从命令，跑回自己该回的地方。此一别也成为弗里达与父亲间的永诀。

有人抓住她的胳膊。一个年轻人，德国人。他让她把胳膊挽起来，手掌摊开。她感到一阵刺痛。一支笔在她左前臂下方的柔软皮肤上刺了一个粗糙的文身：A25080。

队伍延伸到一间宽敞的大厅里。接着，事情的节奏开始加快。女人和女孩开始脱衣服，一丝不挂地站在那里，衣服扔在地上，眼睛盯着地面，双臂交叉放在胸前。这时，她低下头，看见她的头发被一点点地剃下，看见它们一团又一团地掉到地上，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攫住了她。然后，她们站住不动，一丝不挂，又湿又冷，不住颤抖。一种叫人难受的极度悬而未决之感正在她们的心中不断滋长。“我们全都心力交瘁……”

弗里达不再说话，冲我做了一个歉疚的表情。她的眼神中流露出两

种痛苦：一种源于昔日的可怕经历，另外一种则是小小的恼怒，但这种恼怒因其存在于当下而被不断放大。淡淡的日光映照在她银灰色的皮肤上。“不，上次我们已经说过这段了……”

我告诉她这没关系。每次重温她的某段故事，我都能得到某些新的信息。但我意识到，弗里达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她八十六岁了，折磨她的不仅有在奥斯维辛染上的伤寒和痢疾所导致的肠梗阻，还有集中营中的酷刑留给她的背痛和颈痛，每次，只要被发现有逃跑的企图，他们便会被施以刑罚作为惩治（之前的会面中，我同她一起跪在客厅的地板上，她指导我做出德国人曾迫使他们每次都要保持好几小时的姿势，与此同时，他们还必须将沉重的砖块一直举过头顶），更有各种与年龄相关的常见病。但她的头脑依旧十分敏锐——敏锐到她时常担心会跟不上时代。记忆力的衰退让她恼怒不已。互联网兴起的时候，她努力让自己变成网络高手；她定期开车出去兜风，以便对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区街道保持熟悉。她发给我一封有一点小错的邮件，随后又发来另一封纠正自己的错误。

她的出生地就在附近。当时，老城南区是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区的中心——从某种程度上说，至今依然如此——但战争让这里变得面目全非（1940年时，城内有八万名犹太人；如今，只有大约一万五千名犹太人生活在这里）。小时候，弗里达家附近有一条宽阔的林荫道，叫作南阿姆斯特丹大道（战后改名为罗斯福大道）。一家人住在公寓的第三层，面向街道。我电脑里有一张弗里达最珍视的个人物品之一的扫描副本：一张拍摄于她家饭厅的照片，整个家族的人正围坐在餐桌旁吃饭，共同庆贺她祖父的七十五岁生日。照片中的十七个人，有十二个在那之后不久便命丧黄泉，其中多数死于奥斯维辛。曾经将房间塞得满满当当的家具，除了一个她母亲在战后设法搜寻到的五斗橱（摆放在我们进行每周